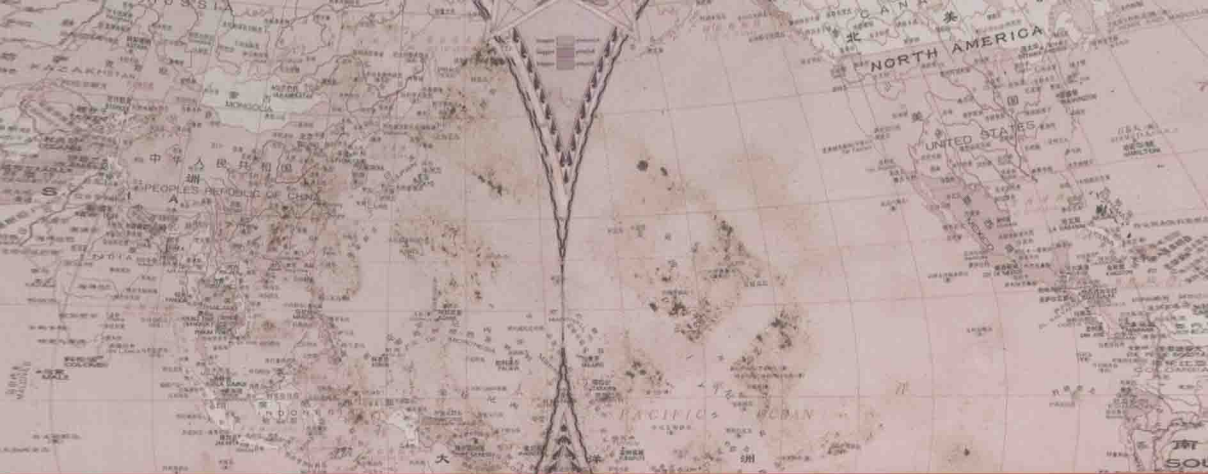




中国与世界

第二辑

CHINA AND THE WORLD

刘德斌◎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与世界

第二辑

CHINA AND THE WORLD

刘德斌◎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与世界. 第二辑 / 刘德斌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2022 - 4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②中国—国情—研究
IV. ①D6②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520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王 曦
责任编辑 刘晓红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 25
插 页 2
字 数 234 千字
定 价 46.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与世界》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 沛 马 敏 王存刚 王胜今 王逸舟 冯绍雷
刘中树 刘家和 刘新成 孙正聿 成中英 朱 寰
朱瀛泉 余伟民 张国刚 张睿壮 李少军 李文海
杜维明 陈志敏 陈志强 林 沅 金灿荣 侯建新
秦亚青 钱乘旦 崔立如 阎学通 黄仁伟 黄 平
黄俊杰 潘志平 Barry Buzan(英国) Brantly Womack(美国)
李剑鸣 季塔连科(俄罗斯)

主 编 刘德斌

编 辑(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秋彬 任东波 孙丽萍

宋 鸥 徐 萍 颜 震

主 办: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地 址: 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东荣大厦 1113 室

邮 编: 130012

电 话: 0431 - 85168357

网 址: <http://iis.jlu.edu.cn>

Email: chinaworld@jlu.edu.cn

高端对话

全球文明对话语境中的中国与世界

——两岸学者的对话

/ 1

文明与大国崛起

——访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迈克·亚达斯

刘德斌 / 12

中国学研究

和平建构的困境与中国的全球权力

[英] 艾伦·亨特 / 17

中国国际法立场的构建

何志鹏 / 32

中国与国际政治经济:非洲的机遇

[肯尼亚] 提根 / 69

中外关系史研究

再论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意义与思考

——以清末民国初期外交为例

王 黎 刘合波 / 79

反思“朝贡体系”:多边多层视角

宋念申 / 92

地区国别研究

“小国主义”的历史意义

姜克实 / 110

来自欧洲的历史经验——也谈中国外交政策的自我克制

[德] 罗兰·福格特 / 127

转移中的权力态势:美国战略转移对中国与北约关系的启示

[瑞士]格雷姆·赫德/140

美国霸权的衰落及权力自西向东转移的前景

——一种理论的视角

[巴基斯坦]李万 阿明/153

论析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希腊福利发展困局

檀 柯/164

汉语走向世界

守望通天塔的岁月

陈 澜/176

语言无界 爱无疆

石 禹/186

英文目录

190

全球文明对话语境中的中国与世界

——两岸学者的对话

时间：2012年8月17日

主持人：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

出席人员：黄俊杰：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

林建甫：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刘中树：吉林大学资深教授

孙利天：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周光辉：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

张贤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教授

王秋彬：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刘德斌：首先欢迎黄俊杰教授来到吉林大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学校人文社科领域的几位知名学者与黄教授齐聚一堂，就全球文明对话语境中的中国与世界这一项目展开座谈。这个机会很难得。我提议大家不要限定条条框框，做自由的学术讨论。上午黄教授为我们做了题为《王道世界观与21世纪大中华道路》的专题讲座，在听众中引发了强烈反响。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逐渐强大起来，但这种强大主要体现在物质方面，在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构造方面，尤其是在能够与世界分享的价值观的构造方

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两岸学者共同开始认真思考和反思的时候了。今天下午的座谈我们可以将黄俊杰教授上午谈到的“王道世界观”作为一个切入点，希望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黄俊杰：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崛起中应该为人类文明作出怎样的贡献，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两岸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而对它的思考同“通识教育”又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我先前经常到大陆来，深感教育大业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具体到今天主题，“王道文化”精神怎样才能与教育融会贯通？目前的教育多注重于外在的、知识的灌输，这个现象在两岸的教育界都普遍存在。一个大学新生来到学校，他的生命并没有得到启发，而是学到了很多将来可能会使其自我摧毁的能力。因此，我认为生命教育在未来海峡两岸的通识教育中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去认知生命的意义、人为何而活等问题。20世纪的学问多半是面对工业文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罪恶等问题而产生的批判与思考。但是到了21世纪，除了政治经济学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生命教育这个重大问题，例如，人和超越主体之间的关系，等等。

刘中树：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对于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算是一个外行。正如刚才黄教授所言，国家的强大、民族的振兴，关键并不是物质的充裕，精神上的、文化上的东西才是最为重要的。而从文化价值理念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又可以归结为人生的、生命哲学的范畴。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对此谈及颇多，例如“天人合一”，例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述的都是人的修养和价值的问题。这些观念能否与我们现阶段所提倡的种种价值理念相结合，能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谈发扬传统文化，那么如何让当代青年来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这就要将其与青年一代的生活环境、生活境遇、生活经验相融合，只有这样才能传承、才能创新。今天看到黄教授所提出的理念，我感觉很有新意。你提到了创新，提到了核心价值观，这都很有意义。我认为，青年一代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希望，我们一定要将传统的东西与他们现实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相联系、相结合，形成一种适应于21世纪的生命价值观。

周光辉：黄教授提出了“王道世界观”概念，并认为可以用它来引领21世纪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并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我认为这个提法非常好，因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应该放在为人类文明提供贡献的大视角下来考察。但我还想问这样两个问题：首先，在今天的报告中黄教授对西方文明似乎抱否定的态度，而如今全球化仍是世界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其中西方文明依然扮演

了强势和主流的角色，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也包括文化和价值观方面。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有您所提出的“王道世界观”如何与西方模式和现代价值观相融合？换句话说，民主、自由、正义等理念是否为西方所独有？它们是否代表了一种现代的普世价值？其次，台湾较好地保留了传统文化，而大陆曾经历了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若干批次“反传统运动”的洗礼，受此影响，传统文化、“王道世界观”等在今天还能否被大陆所接受？大陆民众能否将“王道世界观”作为一种现代价值观去看待？虽然大陆也涌现了一些研究“国学”的热潮，但人们只是将其视为传统的回归，并没有作为一种现代的价值观。因此，“王道世界观”作为一种概念如何能够为大陆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所接受？

黄俊杰：传统思想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还能否为人们所接受？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百年来中国人追求的都是富国强兵。哈佛已故汉学大师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学问上的造诣非常深，他的第一本书是《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的兴起》，第二本书是关于对严复的研究（*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an Fu and the West*），研究近代中国对国家富强的追寻。但是在今天，中国已经达到了国家富强的初级阶段，应该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了。我认为，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华大地上存在三股思潮：一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学），第三是来自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关于马克思思想，我个人认为一定要正确区分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人文精神表述的马克思思想，后者包含了青年马克思对人文的关怀和憧憬，我觉得这与我们儒家精神是可以互通的。在台湾，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孙中山“三民主义”与原典“三民主义”也是需要加以区分的。其中我对传统思想的态度并不像周老师那样悲观。关于“王道世界观”，只要我们讲得够深，高度够高，就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此我比较有信心。传统思想是我们中国人的学问，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自由主义，它们的缘起都不是中国的学问。只是它们讲得够深，就能够为人们所接受。今天，我们无论讲国学还是哲学，都切勿将其视为文化化妆品，必须将其深入内心，才能改变生命，这也就体现了我一开始所提到的生命教育的重要性。这其实是我们东方文化最擅长的地方，无论儒、释、道，东方传统的伟大精神都在于讲“心”的学问。

孙利天：对于上述两个问题，我也都有过一些思考。首先，关于21世纪中华文化的发展道路和方向选择，我觉得引申开来这可能也是当代世界所面对的一个全球性问题。20世纪下半叶开始，就我所从事的哲学研究来看，整个西方哲学也面临着一个困惑，也在探寻它们要走的一个新思想道路。在

我印象里有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2003年，欧洲最重要的两个哲学家——德国的哈贝马斯和法国的德里达联手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欧洲的复兴》。这篇文章问世的背景可能是这样的：西方文明从启蒙运动以来，它所达到的文明成果在今天已被称为“美国价值”。就是说，启蒙运动的成果到现在已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普世价值。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据此提出了一个问题：除去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价值，欧洲还有没有区别于美国的独特价值？他们实际上是在探索欧洲文明区别于美国的独特道路，他们也在思考今后欧洲文明的走向。刚才黄教授提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西方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其实除了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自由主义的主导影响之外，欧美在哲学意义上给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影响体现在后现代主义的传播。后现代主义实际上也是基于对现代性问题和困惑的一种反思，在此基础上谋求新的道路。因此，我想黄先生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共同话题。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可能需要一种后工业化的新的文明方向。这可能也为中国文明走向世界并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提供了历史契机。港台学者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保留比较好，而大陆学者在近些年也有此“愿景”。包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例如，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走向世界”，中国的老一辈哲学家也喊出了“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样的口号和企盼。但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报》组织了一系列专题文章，其主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其中我发表的那篇文章在态度上是比较保守的，题为《寻求和凝练当代哲学的中国元素》。文章中我认为，现在谈走出去还为时尚早，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的工作是：寻求凝练，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支撑我们走向世界的中国哲学元素。那么如何来寻求和凝练呢？刚才诸位教授也谈到了，现在我們有没有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根底？最近几年我在写文章时也曾谈到，我们要寻找“活着的传统”。在老中青几代人中间，我们真实的文化心灵中还有多少是延续着的、在我们的观念和行为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活着的传统”？我认为传统元素还是真实存在的。对现代的年轻人来说，不管改革开放、现代化、全球化和发达的媒体对他们施加了怎样的影响，但作为中国人，他们在文化心灵固有的一些对人际的感知、对世界的感知中还有一些存活着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元素。我认为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现实基础。必须把这些东西捕捉到，认清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还是传统的中国人、我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中哪些文化传统在真实地制约和规范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在这些问题上，文化是“根”，这个“根”要是断了，就会像中国

哲学界一直流传的一句话那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有些人将中国传统文化称为“游魂”，魂不附体。我认为，真实的“体”就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就在我们心灵生活中对活着的传统元素的延续之中，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本体。文化典籍只有与这些本体实现对接，传统文化，包括黄教授所提出的“王道世界观”才可能在中国人心里生根。

另外，我们需要凝练有可能为世界哲学、当代哲学作出贡献的中国文化元素。这可能就需要两岸学者在各自不同的社会经历、政治经历中去概括我们这百年来的思想经验。百年来大陆与台湾在实践着不同的道路，我觉得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港台学者与大陆学者隔阂较深，因为二者生活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中。举例来说，港台学者对大陆学者有时存在一种“蔑视”，认为大陆学者过于软弱，不敢反抗。事实上这也体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极端的政治专制所具有的威慑力，不那种环境中生活是难以体会到的。另外，对于大陆数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港台学者也未必可以真切地了解。用黄教授刚才提到的通识教育举例来说，我先前是吉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部老师，我曾半开玩笑地说，这是大陆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体系。中国大陆的高等院校直到90年代之前都没有通识教育，只有政治理论课教育，而这些政治理论课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类似港台通识教育的作用。记得80年代我在《参考消息》上曾看到一篇文章，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各国公民的科学技术常识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中国大陆居民得分并不低。考虑到当时中国基础教育覆盖率不高，这个结果其实是比较奇怪的。我想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多年的马克思哲学教育普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生产队队长也能说出“一分为二”这样的理论语句，足见这种空前的、通过意识形态灌输的马克思哲学普及的效果。它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普及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当时大陆正是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了通识教育。这种政治理论课教育包括近代史纲要、法律基础常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等等。90年代以后大陆采取了变通的方法，用一些公选课、选修课等方式来补充原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所不能完成的通识教育任务。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黄教授所说的“王道世界观”，它们要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其实还要经历很漫长的积累、探索的过程。也正是由于港台学者不同于大陆学者的社会阅历和社会经验，两岸学者有必要将这几十年来彼此不同的思想教育的经验做更多交流。在这方面我同黄先生一样充满了信心。因为我先前曾听到一个留学生讲，中国人口众多，什么人才都有。这个积累、探索的过程可能比较漫长，从大陆哲学圈来看，有几位学者我还是比

较看好的，例如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赵汀阳老师，他论述的“天下帝国体系”，同黄教授的概念在思路比较接近。还有首都师范大学的陈嘉映老师，他的研究方向是语言哲学，同时也提出了凝练中国哲学元素的一种路径，即对中国话语体系的哲学分析。在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中，有着使这种话语体系得以可能的最基本的概念框架。我觉得这种研究很有意义——找到构成中国世界观的最原初的概念结构，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切入类似的话题。做一个类比的话，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构成计算机源程序的话语结构，对它的分析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中国话之所以是中国话、中国哲学之所以是中国哲学的最基本的元程序。赵老师和陈老师的工作都很建树，但是也都要经历漫长的道路。

第二个话题，关于个体生命和超越存在的关联、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追求，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首先，就像刚才刘教授所说，必须要切入对当代中国青年、中国大学生的现实关怀。青年一代最关心的是什么？可能是就业、婚姻、住房等比较现实的方面。这与中国目前冷酷的经济逻辑有关，他们不得不去考虑，否则就难以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中国青年处于较为艰难的时期，不同于我们老一代上山下乡时体力上的艰辛，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压力。我想通识教育也好，超越的、形上的教育也好，都必须与当代青年、当代大学生的生存处境勾连起来。

另外，谈及生命教育和超越生死，中国在这方面也存在一个短板——一般来说中国缺失宗教，因此也就没有一个绝对理性的信仰，没有一个绝对普遍的信条或者法则。这或者是源于中国文化的一个缺陷——任何事情都可以变通，这对当代普世价值下的法制精神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更大的问题是，没有这种超越的敬畏，人们就可能无所不为。在市场经济中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在西方人看来难以想象的恶劣事件，可能就是因为中国人缺乏信仰。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没有一个人格化的、对象化的、超越的实体的神的存在，但是对良知的、良能的设定仍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根基。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的道理人人都懂，但关键的是怎样形成一种笃行。具体到传统文化和通识教育问题上，我认为其困难部分来自于当下的教育体制，学生和老师间的沟通和交流过于匮乏，通识教育很难在行为层面发挥作用，学生在人格、操守、心灵、教化等方面的教育成果很难得到巩固。儒家对此也有说法，称作“择善固执”（《礼记·中庸》：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只有通过日常的、实践的不断积累和巩固，这种教育才能起到真实的作用。

黄俊杰：感谢孙教授全面而深刻的见解，我感到很受启发。首先，关于

凝练当代哲学的中国元素，我想这是海峡两岸学者在未来几十年里的一个重要事业。我所在的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里有很多内地重点高校的青年访问学者，我期望这种交流和沟通可以进一步持续和发展下去。“寻找活着的中国传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每年春节前，广州火车站都有数不清的赶着回乡的民工，不管多么拥挤多么困难，他们都要尽全力回到家乡，从这里我就看到了中华传统复兴的希望，传统中国的价值观依然嵌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最深处。最近几年，我跟欧洲的学者朋友持续合编两套系列丛书，我们在台湾大学的中文丛书也包括6大系列，170余本。其中有44本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发行了简体字版，也获得了大陆一个出版奖项。我与欧洲朋友合编两套丛书，一套叫做《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精神》（*Humanism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另一套叫作《人文精神的再思考》（*Reflections on Humanity*），出英文版及德文版。我深感今天我们所讲的“人文精神”已经被欧洲启蒙思想所左右，充满了欧洲中心论的意味和偏见。我们应多注重来自亚洲、特别是来自东亚儒家的传统思想。我在2010年出版的《东亚儒学脉络中的人文精神》（*Humanism in East Asian Confucian Context*）一书，就是申论东亚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涵。我觉得两岸的合作可以使学者将最好的中国元素阐释出来。

第二点，孙老师讲到必须关注中国当代大学生的生存环境和心灵状态。这使我想到了20世纪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所说的“存在结构”（*existential structure*）的问题，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哲学大家。他代表了一个对柏拉图传统的再纠正，与我们中国哲学已经很接近——那就是身体哲学，其核心为“体验”。我认为，中国的身体哲学在未来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点，孙老师刚才谈到了“对超越的敬畏”，对此我深表赞同。对生命的反省越深刻，我们对于先验的（*transcendental*）东西就越会有一种敬畏。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欧洲启蒙文明有极大的改正空间，可以用我们东方的传统对其加以修正。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就是启蒙文明（*Enlightenment*），而启蒙文明是抵制宗教的，并对费尔巴哈等人都有所批判。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极具意义，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9·11”事件之后，哈佛大学的课程结构进行重组，增添了两大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第一个是“美国与世界”（*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9·11”事件发生之前，美国人自以为美国就是世界，而在“9·11”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活跃着其他人；第二个是“文化与信仰”，人们重新认识到了“信仰”在21世纪的重大意义，而对超越的敬畏其实本来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

之一，孔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就可以这样理解。

林建甫：我本来是学经济的，而且偏向量化思维，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近年来跟着黄院长学习，才逐渐开始思考一些思想上的、哲学上的大问题，受到的启发非常大。我觉得两岸现在不能只着眼于经济上的交流，应该透过经济来开辟新的、尚未涉足的交流领域，这是解决两岸之间存在的种种难题的大方向。很多问题最后都需要通过中华文化的视角来解决，达到两岸人们共同的期待。

张贤明：今天听了黄教授的见解，有很多收获，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与黄教授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同时也希望我校行政学院与贵校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能够建立合作关系，开展教育与科研上的合作。

王秋彬：刚刚大家主要通过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等中华文明内部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而我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关注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互动情况。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黄教授所讲的中国的“王道世界观”是否真正可行？黄教授曾提到“王道世界观”的一个实质就是分享，而不是独占。但若将这种理念运用于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很难行得通。很多时候国家间处理双边关系特别是主权问题时主要是排他的，是倾向于独占的。我们经常说“主权问题不容商量”就是这个道理。例如钓鱼岛和黄岩岛问题，国家之间就很难分享，彼此也都不会同意。因此，我认为“王道”的理念在外交实践中可能会使中国面临遭小国欺负并被牵着鼻子走的危险。

另一方面，我还在想，无论“王道”还是“霸道”，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去支撑。中国的崛起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十几年前中国人主要考虑的是温饱问题。而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人也才有了更多可能去考虑物质之外的东西，例如推广文化软实力、建构区域乃至世界秩序等，希冀推动建立一个持久繁荣、和谐的世界。迄今为止，中国的言行正在超越“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赢得越来越多的赞誉。因此，我认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应当是“王道”与“霸道”相结合。有时候，中国可能也需要采用“霸道”的手段，去实现“王道”的目标。

黄俊杰：你的看法很能扣紧现实，汉宣帝早就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未来的动向是美国学界关心的议题，最近有学者检讨从大宋帝国和明帝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关系，指出从960年到1644年之间中华帝国一直是依循国际权力均衡的态势，而在“和”与“战”之间移动。这位学者推测，21世纪中国如果力量较美弱时，中国就会采取守势；但如果时势

对中国有利，中国会变得较为强势。^① 相应于中国的崛起，学者对于美国未来政策的建议也颇为分歧。基辛格在最近的新书中认为，美国应避免中美双方悲剧性的冲突，应该面对中国的崛起，以优雅的姿态让位。^②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美国对于中美两国利益冲突的领域，应该采取强势的立场。例如 Aaron Friedberg 在去年的新书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W. W. Norton, 2011) 就持这种主张。

但是，从当前国际学术界的论述来看，我觉得你所认识的国际关系可能还是 21 世纪之前的模式，思维主要还是停留在以国家为主的框架上，但是现在世界已经步入了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 (Peter Ferdinand Drucker) 去世前在《外交》杂志 (*Foreign Affairs*) 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讲到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中央政府对汇率还有主导权，因此“国家”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对此我表示赞同，在这个立场上我也同意你刚才的一些说法。但你的论述还存在几个盲点，我想借用哈佛大学社会学大师西达·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 的《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一书中的观点来说明。这本书是她最经典的著作，其中考察了法国大革命、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苏俄革命并将三者相结合，在吸收马列主义精华的基础上对其提出修正，十分精彩。关于“超国家联盟”，西达·斯考切波于 20 世纪 70 代在那本《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就已经提到，而这种预测在 2003 年伊拉克战争美英联盟的例子已经得到应验。

另外，在对国际关系问题进行思考时，国家框架固然重要，但我们必须要注意“超国家”形态。入江昭 (Akira Iriye) 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学者，他的很多著作都很有见地。入江昭早年研究领域是美国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尤其以研究美国与东亚关系史为主，著作等身，极受史学界之推崇。自 1980 年代以后，入江昭特别提倡“跨国史”研究，他在 1988 年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就任演说词中，就强调在全球化潮流中历史研究的国际视野之重要。入江昭认为历史研究可以分为国家史 (national history)、区域史 (regional history)、国际关系史 (international history)、全球史 (global history)、跨国史 (trans-national history)，而“跨国史”研究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跨国史”研究可以促进多元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对话，以缓和各国之间的冲突；借由文化之间的交流，则能达成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秩序，建构文化国际主义

① 参看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参看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0。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他所著《文化国际主义与世界秩序》(*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这一本书就提出了上述学说。入江昭在 2007 年 11 月, 应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之邀发表演讲, 强调“跨国史”研究以不受疆界限制的全球性议题和发展为研究对象, 亦不限制特定国家或特定区域。全球化使得许多历史学者开始认为, 某一国家、某一区域的历史应该被视为全球历史的一部分。入江昭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一个系列讲座, 后来又以演讲内容为基础出版了我刚才说的那一本书, 讲文化全球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的问题。日本的平野健一郎教授近年来思考“国际文化论”, 他在所著《国际文化论》(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0 年版)一书中, 以文化交流为中心, 提出“动态的国际关系论”, 申明国际关系中文化的重要性。我觉得文化问题是未来几十年里学习国际关系的人所必须要思考的方向。我们有很好的本土资源, 即中华文化。入江昭是唯一一个非美国本土出生而被选为美国外交史学会会长、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学者, 见解非常深刻。

关于东海和南海问题, 我认为应该发挥中国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优势, 这种优势不是西方那种对硬实力的展示, 而是对“氛围的营造”。去年亨利·基辛格有一本新书, 题为《论中国》(*On China*)。在书中他讲到 1972 年访华时, 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 欢迎他来到中国。周恩来在当时所说的第一句话为, 美国的历史有 200 年, 但我们人民共和国只有二十几年的历史, 需要多多向美国学习。基辛格知道这是一种恭维, 但仍然很高兴。他曾说道, 中国外交官同美国外交官有很大不同, 举例来说, 美国外交官的行为方式类似于: 我们有 5 个议程, 妥协 2 个, 赢得 3 个; 而中国外交官擅长氛围的营造, 把人们完全包围住, 使对方不得不说“Yes”。我认为, 国际关系中氛围的营造是崛起后的中国所必须要注意的。可惜海峡两岸政治人物都越来越西化, 他们更多的还是需要中国学问的润泽。中国政治文化最重要的是氛围(也就是法文所谓 l'ambiance sociale)的创造, 21 世纪的大中华需要雄才大略、识见宏远的政治人才。

刘德斌: 感谢各位的精彩发言。我想大家都从黄先生、刘先生和孙先生的高论中学到许多东西, 同时也从光辉、贤明和秋彬的问题和建议中得到许多启发。海峡两岸学者虽然经历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但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今天, 考虑的却是同一个命题。这就是物质上已经愈益强大的中国和华人社会能够凭借什么样的文化体系与其他文明展开对话? 能够为全球人类共同体的构建奉献什么样的价值观? 台湾有许多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深入探索了。记得第一次去拜访黄先生的时候, 他所领导的台湾

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事情有三件：一是黄先生的团队所出版的学术作品不仅用中文，还用英文、日文、韩文、越南文、德文等多种语言发行，一直在参与文明之间的对话；二是黄先生将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相结合，甚至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商业管理相嫁接，不脱离今天的实际；三是黄先生把通识教育与大陆所说的核心价值的挖掘和阐释直接联系在一起，并上升到与人类其他文明对话和共享的高度，这就使中华文化的研究，或者用孙先生的话来讲是“凝练”，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时代和世界意义。大陆的许多学者和学术机构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今天的座谈是一个思想的盛宴，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如建甫刚才所谈，两岸不应该只限于经济交流，两岸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一定会为当今世界奉献更多的精神食粮。《中国与世界》愿意为两岸学者共同塑造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交流与对话提供平台。谢谢大家！

（文字整理：郑广超）